

爷爷当红军的故事

□ 邹时林

爷爷邹新银，1913年4月（农历）出生于江西瑞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爷爷有三兄弟，他最小。二哥参加红军北上杳无音信，新中国成立后被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。爷爷家里非常穷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了下顿，幸亏好心的亲戚时常来接济，送点米油之类，日子才得以勉强活下去。

爷爷小时候喜爱读书，由于家里一贫如洗，交不起学费（上一年私塾要交几担谷子，私塾是由村里有文化的人办的启蒙教学班），自然读不起私塾。但爷爷趁着不用干农活的空当，时常跑到村里的私塾去旁听，成了一名旁听生。好心的私塾先生看到爷爷听得很认真，不忍心把爷爷赶走，还时常教爷爷认字。久而久之，爷爷也就认得一些字了，那时的课本很简单，例如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《增广贤文》等。这为爷爷后来在部队中担任连队的文书奠定了一定的文化基础。

红军来了,加入少先队,当上了少先队副大队长

1930年，瑞金境内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暴动成功，推翻了当地的国民党政府。此后，瑞金各乡很快建立起苏维埃政权，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。

在家乡建立的苏维埃政权，叫乡政府。乡政府组建了一些社会组织，比如儿童团、少先队（即少年先锋队）等。许多青少年都加入了少先队，爷爷对这个新生的组织感到好奇，很快也加入了少先队。那时，加入儿童团或少先队有一定年龄的限制，而且还有家庭出身的要求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的。由于爷爷个子高，做事认真负责，积极性高，乡政府还让他担任了少先队副大队长，成为乡政府的干部，协助乡政府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。在乡政府工作期间，爷爷不仅认识了更多字，还学会了打算盘，学会了算账，增长了不少文化知识。

告别新婚妻子,远走他乡当红军

爷爷结婚后不久，毅然参加红军，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的一名战士。

到了部队，爷爷被编入红三军团第三师第十一团第三营第九连，那是彭德怀指挥的部队。爷爷说：“我见过彭德怀，个子不是很高，有些胖。彭德怀的部队有个连曾在我们家驻扎过，时间很短，连长、指导员很年轻，对老乡很客气。部队临走之前，把老乡的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水缸挑满水，东西摆放整齐。”

参加红军后，爷爷过上了部队的生活，红军战士的生活十分艰苦。爷爷回忆起那段艰苦的生活，不无感慨地说：“红军的生活真苦啊！我到了部队，只发了一套军服，一个斗笠，没有更换的衣服。如果行军碰上下雨天淋湿了衣服，也只能让它自然干了，或者

部队停下休息的时候，点一堆火，用木棍搞一个架子，把衣服放在架子上烤干。不少战士因长时间穿着湿衣服害了病。战士的口粮也是严格定量，常常吃不饱。打仗时，发的子弹也不多，连长要求战士瞄准后再开枪，千万不能乱放枪。”还说：“在红军部队中，官兵平等，很少有打骂士兵的事情发生。高级指挥员生活上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，吃穿也非常朴素。战斗冲锋时，排长、连长都会冲在前面，战士们跟着冲。”

作为一名普通红军战士，爷爷是不知道红军每次行动要去哪里，但是他知道，自己要一直跟着部队，不能掉队。部队经常是白天睡觉隐蔽，晚上行军，有时夜间走路搞不清东南西北，就靠着天上的北斗星来辨别方向。这种昼夜颠倒的行军生活，爷爷起初很不适应，白天睡觉经常睡不着。我好奇地问爷爷：“红军作息时间为啥要颠倒过来呢？”爷爷无奈地回答：“那也没办法，我们的武器比国民党部队差，我们红军的武器主要是步枪，国民党部队有飞机、大炮。白天行军容易暴露目标，一旦被国民党的侦察机发现，马上就有敌人的飞机来投炸弹，麻烦就大了。我们晚上行军，敌人就很难侦察到了。但是，在晚上行军时，我们的火把不能点得太多，以免被敌人发现。”

爷爷在部队除了行军打仗外，还抓紧学习文化知识。讲到在部队学文化的事情，爷爷记忆犹新，深情地说：“那时候，指导员常常抽空来教战士识字，并告诉战士，世上没有什么菩萨救世主，要靠自己；世上也没有什么鬼神，要说有鬼神的话，鬼神都是人扮成的，吓唬人的。”

被人举了手,当起了连队文书

爷爷从小体质较弱，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广昌战役中，得了一场大病，住进了部队在石城的后方医院，没有上前线冲锋杀敌。但爷爷对广昌战役的残酷历历在目，他说：“我住在医院，每天看到许多战场上受伤的战士抬进来，有的战士缺胳膊少腿。”一天，一位连指导员来到医院，因为连队文书牺牲了，想到伤病员中挑一位有文化的战士做文书。这位指导员问爷爷这些伤病员：“你们当中有哪位会识字的吗？请举手！”这时，没有人举手，一片寂静。在普通红军战士中，会识字的士兵可谓凤毛麟角。过了一会儿，突然，爷爷的手被旁边的伤病战士举了起来，弄得爷爷非常尴尬，面红耳赤，心扑通扑通地跳。这位战士和爷爷是同村老乡，一起来当红军的，对爷爷比较了解，知道爷爷有点文化，碰巧他也生病了，住在医院治病。爷爷觉得，虽然自己认识几个字，但还是胜任不了文书工作，于是没有主动举手。指导员拿了一张报纸过来，点了几个简单常用字给爷爷认，爷爷认对了，就这样，爷爷就成了连队的文书。

爷爷说：“做文书，连队大小事情都要

记，还要将上级来的文电念给连长听。连长没有文化，不识字。指导员有文化，不认得的字就问指导员。”平常吃饭，和连长、指导员一起吃，虽然不会开什么小灶，连长、指导员知道爷爷的身体较弱，会适当照顾一下，比以前吃得略好一点。
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党中央和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，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。至于长征出发前的细节，爷爷作为基层的普通战士知道得很少，只知道跟着大部队走，不要掉队。在爷爷的印象中，他在长征途中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打得非常惨烈，国民党军的飞机来轰炸，部队伤亡很大。爷爷说：“一个连队开出去，只剩下七八个回来。”这一仗很可能是湘江战役，湘江战役中，很多红军战士牺牲了，部队由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。当时爷爷打摆子（患疟疾），没有到前线作战，后来部队看他身体很虚弱，便把他留在当地的农民家养病，部队还给了这户人家一些钱物，让他们好好照顾爷爷。爷爷于是留下养病，没有继续长征。具体那户人家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，在什么地方，爷爷已经记不清了。

病好后回到家乡,奶奶几乎认不出来

在老乡的精心照料下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，爷爷的病竟然神奇地痊愈了。爷爷想了想，部队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还是回家吧！爷爷谢别他养病的那户人家，一个人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我曾好奇地问爷爷怎么找到回家的路，爷爷告诉我：“我也不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，一路问，问到江西怎么走。到了江西境内，问到赣州怎么走。到了赣州，问到瑞金怎么走。到了瑞金，就知道怎么回家了。”爷爷一路上讨饭度日，有时住在老乡的屋檐下，有时住在破庙里，衣服穿得破破烂烂，完全像个叫花子（乞丐）。回家的时候，不能穿红军的军服，一旦被地主武装和国民党部队认出来，性命也难保。

经过长时间（具体走了多少时间，爷爷也记不清了，有好几个月）的跋山涉水，大概是在1935年春的一天，爷爷回到了家。回到家时，奶奶几乎认不出爷爷了，奶奶说：“爷爷瘦得皮包骨，衣服破烂，还以为他是来讨饭的，后来他自己讲出来自己的名字，我才认出来。”

党和政府没有忘记爷爷。改革开放之后，随着国家经济状况好转，当地政府把爷爷定为苏区干部，每月给爷爷发放抚恤补助金，以资生活之用。

爷爷一生勤俭持家，生活很有计划。我清楚记得，爷爷70多岁的时候还做豆干卖。那时，我才七八岁，晚上，经常站在火炉旁看爷爷烤豆干，爷爷会把不小心翻烂的豆干给我吃，我吃得津津有味。爷爷经常教导后辈子孙要有忧患意识，有吃的时候不要忘了没吃的时候。

（摘自2018年第3期《党史文苑》）



婶婶楚青有时对朋友说：“其实我家的孩子是比较多的！”她说的这个“多”字，除了两个烈士子弟外，也包括我。我自幼跟随祖母生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叔叔粟裕把我和祖母接到南京一起生活。从此，我对叔叔有了更深入的了解……

叔叔作为军事家，有他特殊的“文房四宝”，即枪、地图、指南针、望远镜。他有一个非常旧的硬壳指南针，只比五分硬币略大一点，他一直当宝贝收着。四样东西里，他最喜爱的又数枪和地图。

战争岁月里，叔叔枪不离身，即便成为高级指挥员，他也总佩着左轮手枪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环境变了，但他仍然爱枪。战斗中缴获的枪、我国制造的枪、外国军事代表团赠送的枪，他保留了好几支。对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枪，他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在他当总参谋长期间，有一天，他的儿子戎生说：“咱们的枪不好，美国的卡宾枪又轻又灵活。”他沉下面孔说：“你就知道洋人的好！告诉你，咱们自己也有好枪——半自动步枪！我们要立足于用自己的武器消灭敌人。”

1960年，部队赠给他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，他十分高兴。由于他左手残疾，不能像健康人一样握枪，就请修理工在下护木上安了一个握把，这样他就可以进行各种姿势的射击了。这支枪也成了他的一件“珍宝”。

叔叔爱地图如命，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地图。在战争年代，每到一個宿营地，第一件事，就是要求参谋把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挂起来。住在老百姓家时，有的人家房子小，也比较矮，只好从地上沿墙壁挂到梁上。他不仅挂军用地图，还挂全国地图、亚洲地图乃至世界地图。一挂好地图，他就在地图前反复研究起来。他的脑子也是活地图，对地形、地貌、道路、桥梁、江河、湖海、城市、村庄、民情、风俗等了解得一清二楚，连哪里有个坟包都记得。同时，他还要求参谋人员也把地图印在脑子里。他说，地图在军事指挥员的脑子里应该是立体的，不是平面的。叔叔爱枪、爱地图，不仅仅是对过去战斗生活的感情寄托，更是时刻关注着战争风云，为国家的安危而枕戈待发。

叔叔同婶婶平时谈话，多是谈形势谈工作。婶婶曾埋怨说：“你就不能谈点别的？”叔叔风趣地说：“我们是革命伴侣嘛，经常商量革命工作很正常。”岂止如此，他对自己的几个孩子，也如同“军事父子”。他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吃苦、耐劳、勇敢、顽强的军人气质，要求孩子“吃饭不可挑食、夜行军不可啼哭、饥寒不可叫喊”，否则就会遭到他的呵斥。

他从不让家属坐他的公车。有一次，他让我们去北京的一个地方看戏，离家很远。他按时坐车走了，让他的儿子寒生和我骑车过去。我们骑了很长时间，出了一身汗，到场时戏已开演。叔叔让我们先冲个凉，他到旁边的小卖

我的军事家叔叔 粟裕大将

□ 粟刚兵

部给我们一人买一件汗衫，让我们换上。他说：“去看吧，还能看到一点。”

戎生两岁多时，叔叔让他学游泳。他让戎生抱着一段竹筒跳进水里。戎生不敢下水，叔叔就一下子抱起来把他扔下水。戎生五六岁时，他送给戎生一支小手枪玩具，并告诫说：“好好学，长大就当兵。”叔叔生前留给戎生的最后嘱咐，也是关于工作的，他说：“师这一级很重要，连、团、师的锻炼对军队干部极为重要。”

叔叔对我也严格要求。当他听到我读高中后，虽然功课比较好，但仍是“捣蛋鬼”时，心里十分不安。他认为，这同我长期与祖母生活在一起，在祖母的溺爱下成长有密切的关系。于是决心让我转学到北京读书，以“严加管教”。

1959年夏天，他就把我带到北京。暑假里，叔叔亲自为我、戎生和寒生制定了作息制度，安排了学习、劳动和文体活动。后来，我放暑假常去北京叔叔家小住。有一次，他说：“以后假期里不要老往北京跑，可以到农村去看看，特别是到老根据地去看看，看看那里人民的衣食住行。”1964年夏天，我到苏北地区过了一个暑假。回来向叔叔汇报在苏北收集到的一些关于新四军巧妙杀敌的故事，特别是在南通芦基港疗养院里，向一位被人们称为“双枪老太婆”的游击队长张妈妈学会了几首民歌，其中一首的前两句就是：“毛主席当家家富，粟司令打仗仗仗胜！”叔叔立即不让我再说下去，并十分严肃地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：那里一些主要作物的产量提高了多少？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多少？那里人民的子弟兵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多少？烈士们的家属与遗孤生活得怎么样，有什么困难没有？结果我一条也没答出来，他狠狠地批评我说：“你算是白跑了一趟根据地。”

（摘自2017年第22期《新湘评论》）



信仰之光，带来民族希望

□ 曹玲娟 辛本健

梧桐掩映的道路上，沿街一幢小小石库门建筑静静伫立。黑漆大门，青砖粉线，屋角红旗飘扬，在蓝天映衬下格外醒目。上海，兴业路76号，当年的望志路106号，百年前的1921年7月23日晚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。

就在树德里石库门，楼下客堂，来自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及共产国际代表，出席了大会。大会详尽讨论了党的第一个纲领与第一个决议。

中共一大召开，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。百年间，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，发展成如今拥有超过9100万党员的大党；百年间，中国共产党领航中国从积贫积弱出发，拼搏奋斗，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……

1920年3月，浙江义乌分水塘村，破陋的柴房里，陈望道用板凳、铺板支起临时写字台，开始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
山区早春，寒气逼人，母亲心疼儿子，煮了两个粽子，配上一碟红糖，叮嘱儿子趁热吃。陈望道全神贯注，竟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吃了。母亲好气又好笑，问道：“吃完啦，红糖甜不甜呀？”儿子浑然不觉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甜，真甜！”

真理的味道是甜的。1920年8月，《共产党宣言》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了，“对中国而言，它如烛光，为黑暗中探索的先驱们带来了光明与希望。”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徐明说。

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的馆藏革命文物，超过12万件（套），国家一级文物121件（套）。其中，1920年出版、由陈望道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文全译本，点燃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之光。

纪念馆里，有1920年8月第一版和9月第二版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。在蓝色封面的第二版《共产党宣言》上，依稀可见两行印签：“张静泉（人亚）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”。

这是从张静泉的衣冠冢里取出来的。1898年，张静泉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一户普通农家。16岁时，父亲张爵谦将他送到上海风祥银楼做学徒。家人和乡亲并不知道，张静泉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把名字改为“人亚”。

1927年，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突如其来，张静泉冒险，将一包旧书报送回家中。匆匆相见，竟是父亲张爵谦与儿子的最后一面。第二年，张家墓地多了一座衣冠冢。据说是因为远在异乡的张静泉失踪了，生死不明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张静泉依然杳无音信。张爵谦让家人打开“衣冠冢”，将墓穴中埋藏了20多年的书报文件，包括《共产党宣言》第一个中文全译本、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，带到了上海，交给有关部门。

2005年，张家后人终于等到消息：1932年12月23日，因积劳成疾，年仅34岁的张静泉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逝世。

（摘自2021年1月19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明灯点亮,指引前进方向

□ 曹玲娟 辛本健

1922年7月16日至23日，同样的炎炎夏日，同样的老上海旧式弄里，在中共一大召开的一年后，辅德里石库门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。

中共二大12位代表，共举行3次全体会议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。近百年光阴，如今，辅德里牌楼依旧静立。

二大开创了中共创建史上的多个“第一”：第一次提出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；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——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思想；第一次公开发表《中国共产党宣言》；制定第一部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；第一次明文提出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的口号。

中共二大与中共一大，共同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任务，中国革命运动呈现出崭新局面。

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里，有这样一件珍贵文物的复印件。一张泛黄的稿纸，是1921年11月中央书记陈独秀向全党签发的第一个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》，文中写道：“明年七月开大会。”

这个“大会”，指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。或许是巧合，中共二大与一大的召开地点仅相差一个字，一个叫树德里，一个叫辅德里。

辅德里625号，正是中央局成员、宣传主任李达的寓所。这里地处原公共租界和原法租界交汇处，相对安全。党创办的平民女校正对李达家后门，一旦出现突发情况，也便于疏散。

会上，12名党代表热烈讨论了中国的时间及对策。为安全起见，二大以小组讨论为主，每次全体会议都要更换地点。

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还原了当时开会的场景：客厅中间放着一张八仙桌和几张方凳，东西两侧靠墙各摆放一个茶几和两把靠背椅。据李达夫人王会悟回忆，当时会场朴素简陋，“并且他们持续不断地开，下楼吃饭的时候，也在饭桌上讨论会务。”

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“人民出版社”，也设在此处。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，在这里出版的刊物上都故意印着“广州人民出版社”字样。

如今，纪念馆的党章历程厅里，陈列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所产生的所有党章或党章修订案，百余种不同年代的珍贵党章版本，铺满整整一面墙。

（摘自2021年1月19日《人民日报》）